

【两会解读】

“电饭煲之间”缘何击中“制造业皇冠”痛点？

代表委员热议“中国制造”如何“蝶变”



新华社 刘敏 张丽娜

“没有理由，那么多企业做不好一个电饭煲！”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谈到“到国外买电饭煲”时“怒了”。

2015年，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5.1%，国家创新能力世界排名提升至第18位，装备制造业规模超过全球比重的三分之一。然而，圆珠笔、电饭煲这样的“小物件儿”，却暴露出我国制造业结构性短板。

两会代表委员发出的“电饭煲之问”究竟如何作答？怎样擦亮“中国制造”这块“金字招牌”？

“那么多企业，为何做不好一个电饭煲？”

8日，人大广东团分组会上，几位代表为“一粒米”讨论开了。

“以前以为电饭煲没什么技术，后来仔细研究了一下，国内企业还真做不了。”小米科技创始人、董事长雷军说，“口感真的好，好像能让米粒在电饭煲里跳舞。”

“什么样的电饭煲？为什么国内做不了？”

“除了日本两家公司，我们没这个专利。”雷军说。

……

今年两会，电饭煲成了“高频词”。代表委员关切之余，也折射出“中国制造”的一些短板：制造业大国，却难觅几个全球叫得响的牌子；是出口大国，但90%以上是贴牌产品；海外大到大家电、小到指甲刀保温杯被人抢，国内一些产能落后的企业库存积压严重……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中国企业有“蝶变”的内生动力，也面临“突围”的外部压力。

“有‘智’才能有‘质’。”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制造业走到十字路口，供给侧改革是唯一出路。

产品“供给侧改革”已是共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实施质量强国战略，打造一批有竞争力的知名品牌。

“以前人们对日用品品质要求并不高。消费升级后，需求侧发生变化。”全国人大代表、美的集团副总裁袁利群说，“企业必须积极回应这一新趋势。”

国货“新比较优势”如何再造？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新兴经济体“承接转移”，“德国工业4.0”计划与“美国工业互联网”战略迅速发展，中国制造业如何突出重围、再造“新比较优势”？

“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精”才能立足，独具匠心的好产品需要“工匠精神”。

“说起中国产品，过去常常联想到质量一般般，就是因为缺乏‘工匠精神’。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是经历了低端转型后才出现了索尼等企业。”雷军说，“过去5年是创造奇迹，未来5年不是再创造奇迹，而是要重创新、补短板。”

好创意需要好制度维护，给创新者以保障，给“精业者”吃上定心丸。一些企业不重视科技研发，仅靠着模仿和山寨，盲目追求规模，形成了产能过剩和结构性供给不足并存的局面，也打击了创新企业的积极性。

董明珠认为，要重拾竞争力，实现供给侧的改革落地，首先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专利保护，让供给侧能够安心于技术研发、设计和制造更好的国货精品；二是支持国货，使国货脱离低质低价的形象怪圈，打造真正的国货品牌。

创新驱动，“谁”来驱动创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61次提及创新。瞄准技术前沿，把握产业变革方向，创新驱动是未来制造业发展的着力点。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基础能力为重点，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

“创新驱动的方向非常精准，那么‘谁’是创新的最根本驱动者？”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曾志权说，“这里面政府要扮演好角色。”

他认为，一方面要继续简政放权，简化企业办事流程，降低办事成本；一方面还要适当增加“容错度”，“企业家的信心建立起来，预期稳定下来，创业的水才能活起来。”

【两会声音】

陈静瑜代表：

呼唤“脑死亡”立法减少卫生资源浪费

新华社 刘巍巍

“我国传统以‘心死亡’为判定标准，宜尽快为‘脑死亡’立法。”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表示，“脑死亡”概念已被世界医学界广泛接受，且美、德、日等国先后立法，承认被确诊为脑死亡就是人的死亡，其社会功能终止。他建议我国从法律上给予脑死亡认可，这将大大避免医疗资源浪费。

脑死亡概念产生于法国。1959年，法国学者在第23届国际神经学会上首次提出“昏迷过度”概念，并开始使用脑死亡一词。

陈静瑜认为，脑死亡立法有利于满足司法实践需要。若不在法律上对它进行界定，诸多法律问题难以解决。他解释，我国刑法许多条款都涉及死亡与重伤问题，并明确规定了对故意及过失致人死亡或重伤的定罪和量刑。在法医学鉴定中，对于认定脑死亡者为死亡抑或重伤，尚难决断。死亡是公民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终止的原因之一。我国民法也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死亡的界限标准不统一，确定死亡的时间不一致，可引起遗嘱纠纷、保险索赔纠纷、职工抚恤金以及器官移植纠纷、‘不合理’死亡认定等法律问题，也直接影响到法律上的继承问题，婚姻家庭关系中抚养与被抚养、赡养与被赡养以及夫妻关系是否能够自动解除等问题。”他在建议中说。

陈静瑜认为，采用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还利于提高器官移植的数量和质量。因为脑死亡者仍有残余心跳，各脏器血液供应得以维持，所以在及时施行人工呼吸和给氧条件下，各脏器组织不会像心死者那样发生缺血、缺氧。作为供体，这些脏器组织有较强的活力，为移植成功提供了先决条件。“可以预期，在脑死亡立法以后，更多需要器官移植的垂危病人能获得重生机会。”陈静瑜说。

陈静瑜认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要用世界上1%的卫生资源为22%的人口服务，有效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问题非常迫切。“但是目前我国没有脑死亡立法，脑死亡概念得不到法律承认，因而医生即便是依据医学标准宣布脑死亡者去世，如果家属不认为脑死亡者已故，也不能撤出治疗措施。结果，脑死亡后毫无意义的‘抢救’和其他一切安慰性、仪式性的医疗活动给病人家属带来了沉重的财力负担，也给国民经济及卫生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他介绍，根据粗略估计，我国每年为此支出的医疗费用高达数亿元。一项调查显示，ICU病人的费用是普通病房病人的4倍，在ICU抢救无效而死亡的病人的费用又是抢救存活病人的2倍。“我们把大量资源浪费于100%不可救活者，这同我们要达到的卫生改革目标不相称。以脑死亡为死亡标准，将大幅减少卫生资源浪费。”

黄洁夫委员：

只有把“蛋糕”做大号贩子才能被根治

新华社 宋玉萌 陈弘毅

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9日的全国政协新闻记者会上表示，根治号贩子需要对医院体系进行改革，把“蛋糕”做大，采取取消医生加号权、取消现场挂号等限制举措大可商榷。

“病人花几千块钱买了一个号，在专家这里几分钟时间就打发了，病人走的时候不是感谢，而是怒气，专家也委屈。”黄洁夫认为，大医院号贩子屡打不绝，反映了医疗资源结构性矛盾严重错配。

黄洁夫表示：“对于号贩子，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是必须的。但是，采取取消医生加号权、取消现场挂号等限制举措大可商榷。这是想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断绝这个事情，大多数政协委员觉得是不可行的。”

对于根治号贩子的举措，黄洁夫认为：“中央不断提出对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对于医院体系而言就是对2万多家医院进行改革，该公立的就公立，该民营的就是民营医院，该慈善的就是慈善医院，把它分清楚，老百姓的选择就多了，医生的合理价格可以在不同的就医环境里很公正的体现。”

黄洁夫现场用“切蛋糕”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了“根治号贩子”的建议：“政府要管的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保证社会公平公正，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医疗，但是多元性的、高端的服务要开放市场，要让社会资本进入社会办医，让民营医院甚至外资进入到市场里来，把这块蛋糕做大，而不是这一块小蛋糕用计划经济来分配。准确一点讲，就是要依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也要发挥好作用。”

【两会花絮】

分层次采访



新华社 殷刚 摄

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姚明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小组会议间隙接受采访。